凌廷堪学术述论

黄爱平

在中国学术史上，清代的乾嘉学派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，则是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。他们继承清初思想家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开创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，提倡读书，注重证据，强调求真求实，有力地矫正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“凡古皆真，凡汉皆好”的佞古墨守之弊，把乾嘉学派推向了发展的高峰。在众多的皖派学者当中，凌廷堪是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位。

（一）

凌廷堪（1757——1809年），字次仲，一字仲子，江南徽州府歙县（今安徽歙县）人。其家世代书香，父亲凌文焆早年读书事文，后因家境凋敝，不得已弃学从商，移家江苏海州。凌廷堪生于海州，六岁丧父，孤儿寡母“困苦穷巷中”①，生计全靠兄嫂维持。母亲王氏典卖衣物首饰，勉强供他上了几年私塾，终因生活所迫，弃学为贾。但凌廷堪聪慧好学，经商之余，坚持自学。一次，“偶在友人家见《词综》、《唐诗别裁集》，携归就灯下读，遂能诗及长短句”②。其后又学作古文辞，均有所成，受到当地人士的推崇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，凌廷堪二十三岁，在母亲的鼓励下，他毅然放弃经商，专心向学，并决意“负米出游”，拜师交友。两年间，他于“饥寒奔走”之际，“时借主人之经读之”，但都因缺乏生计，又苦于“文义渊深”，多次“倦而弃去”③。乾隆四十六年，凌廷堪应两淮盐政使之请，至扬州为其校勘词曲，“得修脯以自给”④。虽“寄食于人，几案少隙”，但他仍刻苦学习，或“取诸经就枕上观览”，或“自课以手钞代读”⑤。在扬州，凌廷堪认识了阮元并与之订交，两人声气相同，“问学相长，各期束身修行，少有所表见于世，以无忝所生”⑥。次年，经当地学者推荐，凌廷堪入京师，受业于翁方纲之门，一面为其校书，一面学习时文，准备应考。当时，正值朝廷开馆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期间，遗文秘册大显于世，文人学者云集京师。凌廷堪与邵晋涵、任大椿、王念孙、周永年、孙星衍等人往来质疑辩难，“互相资益”，又得读同乡先贤、著名学者戴震遗著，学业日进，识见益精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凌廷堪于屡困场屋之后，终于考中进士，继而殿试三甲第二十六名。为便于奉养母亲，读书治经，他自愿放弃例授知县一类的优厚禄位，到安徽宁国府出任府学教授。此后十余年中，凌廷堪“孝弟安贫，谨身节用”⑦，一面以微薄的俸禄维持全家生计，一面利用讲经授课之暇，潜心治学，勤奋著述，先后撰成《礼经释例》、《燕乐考原》、《元遗山年谱》等书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，凌廷堪的母亲、兄长、妻室不幸先后去世，他孑然一身，无所寄托，惟日与经书相伴，授徒治学而已。不数年，即因心力交瘁，一蹶不起，于嘉庆十四年辞世，终年五十三岁。

（二）

乾嘉时期，是考据学日丽中天的时代。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，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运用考证归纳的治学方法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校勘，乃至金石、地理、历算等各个学科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有力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。凌廷堪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，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。他“少好六朝辞赋，为文喜作选体”⑧，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出游之后，始究心经史之学，特别是当他读到戴震遗著，又接触到当代众多著名学者之后，便很快接受了考据学家尤其是皖派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，并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推而广之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。

其一，反对宋明理学。乾嘉汉学是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，理学末流空疏措大，主观臆断的流弊受到许多汉学家的猛烈抨击。特别是著名学者戴震，继承前代思想家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，从自然观、认识论以及伦理观方面，深刻批判了程朱理学，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，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。凌廷堪私淑戴震，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。他指责理学援引释氏，穿凿附会，汩乱圣道，遗害后人，说“自宋以来，儒者多剽袭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吾圣人之遗经，其所谓学，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，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“⑨。对程朱理学家推崇备至的“理”以及“天理”、“性理”一类的说教，凌廷堪更是深恶痛绝，直斥其理义之说为“禅学”。他考证说：“《论语》及《大学》皆未尝有理字，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。是以宋儒论学，往往理事并称，其于《大学》，说明德曰：以具众理而应万事；说至善曰：事理当然之极；说格物曰：穷至事物之理。于《中庸》，说道也者曰：道者，日用事物当然之理。其宗旨所在，自不能掩。又于《论语》，说知者曰：达于事理；说仁者曰：安于义理；说吾斯之未能信曰：斯指此理；说不知而作曰：不知其理；说知及之曰：知足以知此理。至于无违下文明有三礼字，亦云谓不背于理。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，尽援释氏以立帜。其他如性即理也，天即理也，尤指不胜屈，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也”。“理事”之说如此，“体用”之称亦然。凌廷堪指出：“体用对举，惟达磨东来，直指心宗，始拈出之。至卢慧能著《坛经语录》，乃云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宋儒体用，实出于此。故其《大学补传》曰：全体大用，《中庸章句》曰：一体一用，又以大本为道之体，达道为道之用。《论语集注》说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以为心即体，欲即用，体即道，用即义。说忠恕，以为至诚无息者，道之体也，万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。《孟子集注》说理也义也，引程子曰：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体用之谓也。至于《论语》礼之用，本无体字，亦云礼之为体虽严，补出体字，以与用对。此外随处莫不以体用对举之。然则宋儒所以表章四书者，无在而非理事，无在而非体用，即无在而非禅学矣”⑩。据此，凌廷堪认为，从唐宋至明清，“圣学为禅学所乱将千年”，因而他慨然以捍卫圣贤之道为己任，说：“自唐以后，禅学盛行，相沿既久，视为固然，竟忘理事、体用本非圣人之言也。悲哉！元明定为功令，学者童而习之，不暇深求经传，妄以理学为圣学，体用为圣言。今试为指出之，亦不敢谓有功于圣学，聊以扞御异端，不使侵我六经而已”⑪。

其二，推崇汉学，强调求实求是。汉代许慎、服虔、郑玄等学者是清代汉学家崇拜的对

象，凌廷堪也推崇备至，认为他们“皆东京之冠冕，洵儒林之翘秀，或长于小学，或精于《春秋》，其大者则功在六经，学通七纬，彬彬乎郁郁乎传姬公之旧典，衍尼山之坠绪”⑫。清代汉学代表人物惠栋、戴震等人“谐声诂字必求旧音，援传释经必寻古义”，凌廷堪也称赞他们“彬彬乎有两汉之风”，认为近世学者翕然从之，“多知崇尚汉学，庶几古训复申，空言渐绌”⑬。针对宋明理学援释入儒、穿凿附会的蹈空之弊，凌廷堪还特别强调考据的作用，主张通过究明经书的文字语言以及古代的典章制度来阐明义理。他说：“儒者不明礼，六籍皆茫然，于此苟有得，自可通其全。不明祭祀制，《洛诰》何以诠？不明宫室制，《顾命》何以传？不明《有司彻》，安知《楚茨》篇？不明《大射》仪，安能释《宾筵》？不明盥与荐，《易象》孰究研？不明聘与觐，《春秋》孰贯穿？如衣之有领，如官之有联，稽古冀有获，用志须精专”⑭。但是，凌廷堪虽然推尊汉儒，崇尚汉学，却并不一味盲从。他对当时一些学者“挟许慎一编，置六经而不习，忆《说文》数字，改六籍而不疑”⑮的佞汉泥古之弊深致不满，而特别强调“学贵虚中，事必求是”⑯，认为“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，夫实事在前，吾所谓是者，人不能强辞而非之。吾所谓非者，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”⑰。凌廷堪把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去，既不苟同汉儒之说，也不阿附时人之具，而是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。

其三，洞察学术流变，综合汉宋之长。凌廷堪生活在考据学极盛的乾嘉时期，本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考据学家，但他却能跳出汉学巢臼，以学者的眼光审视千百年来的学术流变，试图综合汉学、宋学之长，走出一条“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”⑱的途径。凌廷堪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清醒的认识，他认为，传统经学的发展变化，经历了汉、唐、宋明至清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，也都有其产生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。他由此概括出学术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：“学术之在天下也，阅数百年而必变。其将变也，必有一二人开其端，而千百人譁然攻之。其既变也，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，而千百人靡然从之。夫譁然而攻之，天下见学术之异，其弊未形也。靡然而从之，天下不见学术之异，其弊始生矣。当其时，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，毅然而持之。及其变之既久，有国家者，绳之以法制，诱之以利禄，童稚习其说，耄耋不知非，而天下相与安之。天下安之既久，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，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。”凌廷堪认为，“当其将变也，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，庸人也；及其既变也，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，亦庸人也⑲”。而清代中叶的学术界，正值汉学方兴未艾，学者靡然向风之时，有的严立汉宋之分，认为二者“一主于故训，一主于理义”，因而一些汉学家“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，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”⑳。等而下之者，甚至“袭其名而忘其实，得其似而遗其真。读《易》未终，即谓王韩可废，诵《诗》未竟，即以毛郑为宗。左氏之句读未分，已言服虔胜杜预，《尚书》之篇次未悉，已云梅赜伪古文”㉑，汉学的流弊正日益显露出来。面对学术界的这种状况，凌廷堪力志“矫其弊，毅然而持之”，他反对一些汉学家“歧故训、理义而二”的做法，而极力推阐戴震“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”的主张，称赞戴震“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，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，以古人之义，释古人之书，不以己见参之，不以后世之意度之。既通其辞，始求其心，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”，推之为“孟荀以还所未有也”㉒。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，凌廷堪也力图扬汉学之长而避其短，取宋学之精而弃其弊，在精研《仪礼》，考证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础上，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义理之说，成为继戴震之后一位既有

相当学术成就，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学者。

（三）

凌廷堪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精通史学，“无史不习，大事本末，名臣行业，谈论时若瓶泻水，纤悉不误。地理沿革，官制变置，元史姓氏，有诘之者，从容应答，如数家珍”㉓。而尤为推崇《资治通鉴》，认为“此书乃史家之绝业，治乱成败，了如指掌，读之则眼界日扩，识见日超，读一次则有一次之益，二次三次则有二次三次之益，不特免王充陆沉之讥，由此而措之，且可成为有用之学”㉔。曾拟撰《通鉴翼胡》、《后魏书音义》二书而未成。凌廷堪又深研乐律，认为“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”㉕，乃“独取燕乐二十八调详译而细论之”，并“稽之于典籍，证之以器数”，著《燕乐考原》六卷，期于“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”㉖，使“学者得是书而读之，乐律之学可以通雅俗”㉗。他如声音训诂、天文历算，凌廷堪也都能“造其极而抉其奥”。他还擅长诗古文词，作诗撰文往往“经礼乐，综人伦，通古今，述美恶，大则宪章典谟，俾赞王道，小则文义清正，申抒性灵”㉘，颇受当时学者推崇。但是，最能反映他治学成就及其思想主张的，当推《礼经释例》一书。

《礼经》又名《仪礼》，相传为周公制作，孔子编定，所载皆古代冠昏、丧祭、乡射、朝聘等仪式礼节。其书虽先后有东汉郑玄注，唐代贾公彦疏，但由于典制沿革，时代变迁，历来学者皆苦其难读。宋代朱熹作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合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及注疏之文通而释之，虽较明白易晓，但不免割裂经文之习，且未卒业。清代江永作《礼书纲目》，则大抵沿用朱熹旧法，补正其书而已。凌廷堪继承戴震的典章制度之学，而立之年即潜心钻研《仪礼》，历经二十二寒暑，前后凡五易稿，直至去世前一年，始撰成《礼经释例》一书。在这部书中，凌廷堪运用归纳条理，发明义例的方法，从《仪礼》所载的各种繁文缛节中概括各类条例，并进而推阐了自己的思想主张。

（1）归纳条理，发明义例。《礼经释例》初名《礼经释名》，重在训诂名物。但由于训诂名物难以赅括《仪礼》一书的各项宏纲细目，因而凌廷堪改为“以例为主”，贯通全书。他说：“《仪礼》十七篇，礼之本经也。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，骤阅之如治丝而棼，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；乍睹之如入山而迷，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。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，虽上哲亦苦其难，苟其得之，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。经纬途径之谓何？例而已矣”。如乡射礼中乡饮酒是饮食之礼，而丧祭礼中有司彻祭毕饮酒之例有与之相同之处，二者属异中之同；又如聘礼与昏礼都有迎宾礼宾之仪，但却各自不同，此则为同中之异。他如“乡饮酒、乡射、燕礼、大射不同也，而其为献，酢酬、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也。聘礼、觐礼不同也，而其为郊劳，执玉、行享、庭实之例则同也。特牲馈食、少牢馈食不同也，而其为尸饭，主人初献、主妇亚献、宾长三献，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也。乡射、大射不同也，而其为司射、诱射，初射不释获，再射释获，饮不胜者；三射以乐节射，饮不胜者之例则同也”。凌廷堪认为，类似这些委曲繁重的节文威仪，如果“不会通其例，一以贯之，祗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，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”㉙！因而他反复爬梳研习，从中归纳条例，并据其性质分为八类，即通例、饮食之例、宾客之例、射例、变例、祭例、器服之例、杂例。其中通例为一般常用仪节，饮食之例、宾客之例、射例、变例、祭例及器服之例为具体仪节，杂例则为难以归类的各种仪

节。在每一条例下，凌廷堪都采取以经证经的方法，广征博引，疏通证明，有时还推而广之，对其中所涉及的某些与其他经书有关的问题进行考证。以《通例》二卷为例，凌廷堪在此归纳出迎宾行礼的数十条大规大仪，诸如“凡迎宾，主人敌者大门外，主人尊者大门内”，“凡拜送之礼，去者不答拜”、“凡一辞而许曰礼辞，再辞而许曰固辞，三辞不许曰终辞”等等，每条之下皆以案语形式，博采书中各类有关仪节加以说明，并根据《仪礼》的记载，对历来学者语焉不详，或言人人殊的《周礼》九拜问题作了详尽的疏解。这部凝聚了他毕生精力，也代表了其治学最高成就的著作，受到了当时学者的一致好评。钱大昕说：“《礼经》十七篇，以朴学人不能读，故郑君之学独尊。然自敖继公以来，异说渐滋，尊制一出，学者得指南车矣”㉚。卢文弨也称“此书出，而天下始无有畏其难读者矣”㉛。

（2）主张“复礼”弃“理”。凌廷堪既反对宋学的蹈空之弊，又不满于汉学的“烦细而不能至于道”，而力图通过对儒家经书和古代典制的研究，来发明圣贤之道，推阐理义之说。《礼经释例》中《复礼》上、中、下三篇，便是他这种努力的代表作。凌廷堪精研《仪礼》，对古代礼制也由熟谙发展到尊崇，在他看来，礼即圣人之道，亦即学问之道。他说：“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，性之所固有者善也，所以复其善者学也，所以贯其学者礼也。是故圣人之道，一礼而已矣”。圣人“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，因君臣之道而为聘觐之礼，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，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，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。自元子以至于庶人，少而习焉，长而安焉，礼之外，别无所谓学也”㉜。据此，凌廷堪对儒家慎独格物说给予了全新的解释，认为“古人所谓慎独者，盖言礼之内心精微，皆若有威仪临乎其侧，虽不见礼，如或见之，非人所不知，己所独知也”。所谓“格物者，盖言礼之器数仪节，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，既习于礼，则当知之，非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也”㉝。既然圣人之道在于礼，学问之道尽于礼，因而凌廷堪极力主张“复礼”，以礼节制人的情、性，进而“复性”以达于道。他说：“夫人有性必有情，有情必有欲，故曰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圣人知其然也，制礼以节之，自少壮以至耄耋，无一日不囿于礼，而莫之敢越也；制礼以防之，自冠昏以逮饮射，无一事不依乎礼，而莫之敢溃也，然后优柔厌饫，徐以复性而至乎道”。若“舍礼而言道，则空无所附，舍礼而复性，则茫无所从。盖礼者，身心之矩则，即性道之所寄焉矣”㉞。凌廷堪以礼为武器，不仅直斥宋明理学为禅学，而且进一步阐发了以“礼”代“理”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圣人之道，至平且易也。《论语》记孔子之言备矣，但恒言礼，未尝一言及理也。《记》曰：‘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’。彼释氏者流，言心言性极于幽深微眇，适成其为贤、知之过，圣人之道，不如是也。其所以节心者，礼焉尔，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；其所以节性者，亦礼焉尔，不侈谈夫理气之辨也。是故冠昏饮射，有事可循也，揖让升降，有仪可按也，豆笾鼎俎，有物可稽也。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，长而安焉，其秀者有所凭而入于善，顽者有所检束而不敢为恶，上者陶淑而底于成，下者亦渐渍而可以勉而至。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此也，圣人之道所以别于异端者亦此也”。而宋儒“说圣人之遗书，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，而事事附会于其所未言之理，是果圣人之意耶”！凌廷堪认为，“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，实有所见也；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，空无所依也”，因而他大声疾呼：“圣学礼也，不云理也”㉟，主张彻底抛弃“理”字，以“礼学”取代“理学”。这一大胆的主张，得到了当时学者的高度评价，阮元称其“说经之文，发古人所

未发，其尤卓然可传者，则有《复礼》三篇，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也”㊱。江藩则推崇其“《礼经释例》一书，上绍康成，下接公彦，而《复礼》三篇，则由礼而推之于德性，闢蹈空之弊，探天命之原，岂非一代之礼宗乎”㊲？

综观凌廷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成就，可以说集中体现了皖派学者的特征。他反对宋明理学，指责理学家空凭胸臆说经，不仅违背了经书原意，而且流于释氏。他推崇汉学，却并不佞汉泥古，而是强调求实求是。他精通经史小学，天文乐律，治学注重发凡起例，使历来视为难读的《仪礼》一书，得以有径可循，有例可依。这些，都使得他和当时的许多学者同样，不仅自身取得了可观的成就，而且推动了一代学术的发展。但是，凌廷堪的治学道路和思想主张，又反映了皖派乃至一代学者的局限。他洞察学术流变，明辨汉宋得失，而试图撷取二者之长，通过博综儒家经典，精研古代典制来发明圣贤之道，推阐理义之说。他的“复礼”弃“理”论，就是这样提出来的。这一主张，既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普遍唾弃宋明理学的趋向，也表现出一代学者探索的困惑和彷徨。即抛弃了宋明理学之后，学术思想界往何处去？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，还处在一个相对停滞、稳定的时期，新的经济因素尚未成长壮大，对外交往的大门又关闭已久，学者既不可能找到新的理论出路，也无法打开近代知识的宝库，他们只能回到过去，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思想武器，寄托自己的理想。如果说，从反宋走向复汉，极力恢复汉人经说，是汉学形成时期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学术路程的顶点，那么，试图通过批判理学、宏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，则是汉学发展阶段皖派学者努力的目标。他们或如戴震那样，借儒家经典以立言，把自己的主张托庇在圣经贤传的羽翼之下；或象阮元那样，极力寻求经书的原意原解，试图“以六经孔孟之恉，还之六经孔孟”㊳。凌廷堪则直接提倡恢复圣人之道，不自觉地走上了复古的道路。时代的局限，锢蔽了一代学者的视野，乾嘉汉学在理论上的缺陷，还在它处于鼎盛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。

---

①⑦㊱阮元《揅经室二集》卷四，《次仲凌君传》。
②④㉓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七。
③⑤　凌廷堪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三十，《手钞诸经跋》。
⑥　张其锦编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卷一。
⑧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十二，《上洗马翁覃溪师书》。
⑨⑰⑳㉒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三十五，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。
⑩⑪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十六，《好恶说下》。
⑫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十一，《后汉三儒赞》。
⑬⑮⑲㉑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三、《与胡敬仲书》。
⑭　《校礼堂诗集》卷五，《学古诗》。
⑯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十四，《复孙渊如观察书》。
⑱　《戴震文集》卷九，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。
㉔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二十五，《与张生其锦书》。
㉕㉗　张其锦《燕乐考原跋》，载《燕乐考原》卷末。
㉖　凌廷堪《燕乐考原序》，载《燕乐考原》卷首。
㉘㊲　江藩《校礼堂文集序》，载《校礼堂文集》卷首。
㉙　凌廷堪《礼经释例序》，载《礼经释例》卷首。
㉚　《钱辛楣先生书》载《校礼堂文集》卷首。
㉛　《校礼堂初稿序》，载《校礼堂文集》卷首。
㉜　《礼经释例》卷首，《复礼上》。
㉝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十六，《慎独格物说》。
㉞　《校礼堂文集》卷十，《荀卿颂》。
㉟　《礼经释例》卷首，《复礼下》。
㊳　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引戴震语。